

學
林
漫
錄

七
集

漫 林 学
集 七

中 华 书 局

1983 年 · 北京

封面题签 许德珩
封面设计 杨华如

学 林 漫 录

七 集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¹/₄ 印张·216 千字

1983 年 3 月第 1 版 198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600 册

统一书号: 17018·120 定价: 1.05 元

目 录

蔡元培与张元济交往琐记	牟小东(1)
怀念我的老师朱佩弦先生	郭良夫(16)
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生活片断	如 雷(26)
学林漫忆	吴小如(34)
忆周予同教授	王春瑜(39)
日记文学丛话	邓云乡(44)
谈明代日记四种	陈左高(62)
坚净居随笔	启 功(65)
《春江花月夜》的再认识	振 甫(75)
杜诗别解(二则)	邓绍基(82)
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辨	柴剑虹(86)
白草考	刘 满(94)
说唐长安的青门	曹尔琴(102)
孔融为什么被杀	徐公持(112)
卢仝“罹甘露之祸”说不可信	姜光斗 顾 启(120)
高明的晚年和卒年	颜长珂(124)
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与林则徐	卢兴基(131)
曾国藩媚外一例	来新夏(138)
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严绍璁(142)

日本正平本《论语》版本源流考	刘昌润(153)
敦煌唐写本《说苑·反质篇》残卷	
校记跋尾	王利器(158)
旧校本《世说新语》跋	蒋天枢(161)
琵琶本《西厢记》考	蒋星煜(162)
漫谈金埴《不下带编》的稿本	王湜华(167)
书林胜语	李致忠(171)
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吴小如(186)
壁画漫笔	潘絮兹(203)
泥塑史话	黄苗子(212)
美术史谈丛	傅以新(216)
萍斋书画札	李铁匠(225)
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	方鸿寿(230)
《近代名家印集》序	刘叶秋(240)
明代杰出的建筑规划家阮安	陈绍棣(243)
北京慈仁寺考略	雷梦水(249)
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简介	(260)
唐长孺(260)廖仲安(262)胡如雷(263)邓魁英(263)金开诚(264)	
古籍与学术著作书目(1981.7——12)	(266)

蔡元培与张元济交往琐记

牟小东

最近看到一批蔡元培先生与张元济先生往来的书信，上自1907年，下迄1940年，断断续续，虽不完整，但二老数十年的深厚友谊却跃然纸上。其中不少关系到政治、文化、教育、出版的史事，颇有意义，抽出数则，稍加说明，以供同好。

蔡为“商务”编书、写书

1902年，商务印书馆设立编译所，需人主持。从前上海石印书盛行时代，如点石斋、同文书局等大规模的印书局，大多有编校机构，聘请翰林出身的文人主持，编校人员也都是举人或秀才出身，因此商务的负责人夏瑞芳（粹芳）等认为也必须请一位翰林来做所长，于是就请南洋公学译书院长张元济（菊生）推荐。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蔡元培（孑民），与张元济原是光绪壬辰（1892）年殿试同年，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蔡元培正在爱国学社任总理，张元济遂推荐他兼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这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那拉氏从西安回銮后，下诏准备变法。蔡元培认为此后科举必将废止，新式学堂必将普遍设立，就与所内同人共同商定着手编辑教科书，由他拟定计划和编辑体例，进行编辑。不久，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廷注视，教育会及学社的主要成员均在预定逮捕之列。蔡元培就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及爱国学社总理的职务，逃往

青岛。

蔡元培去后，商务请张元济任编译所所长，积极进行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蔡元培离开商务，仍然为它物色编辑人选，并编著教科书。1907年春夏之交，正是蔡元培在北京静候派遣到德国留学的时候，因孙宝琦任驻德公使，答应每月助学费银三十两，并与商务印书馆约定，编书取酬，每月送编译费一百银元，以供家用。1907年4月27日张元济致蔡元培信中说：

“修身书第一册稿本已收到，感谢无已。未去国前，如有续成者，仍望见寄为禱。”

所谓“修身书”，就是蔡元培给商务印书馆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一共编了五册。

1909年4月18日张元济致蔡元培信中说：

“初八日奉到闰二月廿七日所寄《伦理学原理》改稿及中岛君译稿。三月廿二日手示及本论第三章之厌世主义并大序均收到。……前来示云：有德论、本务论，是否必须补译，抑或不补？并乞明示。如须补译，务祈译寄，俾即印行，以臻完善，尤为感幸。惟查《伦理学史》一种，本馆早已出版，销路亦尚好，拟请大笔将此书修润再印，可以不必另译。如尊处已经开译，务祈暂缓，再行酌核。如尚未着手，则可不必译矣。

兹将《伦理学史》并原书各一册寄呈。”

蔡元培所译的《伦理学原理》，作者为德国泡尔生教授，日本蟹江义丸转译为日文。蔡元培根据蟹江义丸的日译本译成中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有序论和本论，本论部分为九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厌世主义、害及恶、义务及良心、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道德及幸福、道德与宗教之关系、意志之自由等。为什么不直接翻译原著而要用日译本转译呢？蔡元培在译者序言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蟹江氏之译此书也，

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议论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

泡尔生原著总名为《伦理学大系及政治学社会学之要略》，其中除序论外，分为四编：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德论及义务论、社会之形态。蔡在信中说想补译德论和本务论（后译作义务论），即泡尔生原著中的第三编。因此蔡氏在《伦理学原理》的译者序言里说：“其伦理学史、德论及义务论当续译之，以公于世。”张元济因商务印书馆已出版过《伦理学史》，所以请蔡不必另译，而是由他对这本书加以校正、润饰后重版。

在这里有必要谈一下蔡元培早期著译书的署名问题。清末，蔡元培曾为麦鼎华所编的《中等伦理学》写过序，序里说：“四书五经不合教育体裁。”被张之洞看到，张对麦鼎华编的这本书大为不满，而且认为蔡元培的序尤其谬妄。商务印书馆惟恐蔡氏的著译如署本名，可能要招致清廷的反对，于是就商请改用笔名。所以，《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初版时，都借其夫人黄世振（仲玉）之名，署名绍兴蔡振。

张的民族气节可钦

蔡元培的一生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对张元济高尚的民族气节知道的却还不多，我们不妨从张氏与汪精卫的关系谈起。1914年初，蔡元培正在科隆布及巴黎附近居住，学法语，从事著译。当时汪精卫等人也旅居法国。同年2月19日张元济致书蔡元培，其中提到：

“精卫先生购书信及单均奉到，已交馆友照单寄呈，内惟《辞源》尚未出版耳。至书价、运费尽可俟书到汇还。精卫先生素所仰慕，有所委托，极愿效劳。”

此信中还问与汪精卫等“是否聚首一处？足迹亦履巴黎城市

否？”末尾并附注：“精卫诸君子祈代致意”。

张元济对汪精卫很是钦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清朝季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但从此天下闻名，人们都把他看成是革命英雄。通过蔡元培从此张元济与汪精卫就结成了朋友。1935年11月14日蔡致张的信中说：

“此次六中全会各方均来参加，在国难期间差强人意。不幸开会式中有精卫兄被刺一案，幸弹力未中要害，现危险期已过，再经调养若干日，可以痊愈。吾哥与精卫兄平日甚为关切，故附闻。”

说明后来张元济与汪精卫的关系是很近的。

但是，1938年汪精卫投敌叛国后，情况就起了变化。最近承张元济先生之哲嗣树年先生见告：“汪精卫当了汉奸后，从南京寄信问候先严，先严断然拒绝与之通信。上海沦陷期间，先严蜷居不出，‘清贫自矢，鬻书为活’。日本当局曾派人来看望先严，乘车到了门前投进名片，先严写了‘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叫我送了出去。日本人看了笑笑登车而去。”

张元济的爱国思想由来已久，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局势，感到“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因此他热衷于变法救国。他对清廷、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政教之不修，举数百万里之沃壤，任人刳割，莫敢谁何”，感到痛心疾首，渴望人人“忧勤惕励，谋所以保兹疆土之策”。张元济在其出版业务上也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例如：1916年，上海有消息说，犹太人哈同将筹印《四库全书》。张元济认为此书是我国文化之宝藏，不宜由外资印行，表示商务印书馆愿引为己任，由于没有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支持而未曾进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前夕，张元济眼见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国事日非，汉奸败类，弹冠相庆，他愤然提笔，编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出版。此书出版

时,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刊登了如下的广告:

“张菊生先生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中华民族的人格》一册。作者校阅《百纳本二十四史》,最近校《史记》时,深有感于古代英雄人格之高尙,足以激扬民族之精神,因就列传及《左传》、《国策》中选取十数人,均舍生取义,复仇雪耻之辈,堪为今日国民模范。并将原文译成白话,分排上下层,对照读之,明白浅显,尤易感动,今欲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此为非常时期不可不读之书。”

此书出版于1937年5月,早于芦沟桥事变仅仅两个月。

夏瑞芳之被刺

1914年2月19日张元济给蔡元培的信中还提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的被刺,信上说:

“夏粹翁于一月十日被凶人在本店门首狙击,当即殒命。凶手被获,审系出资雇来。说者谓原因由于闸北一役。以私见揣之,未必尽确,大约主因皆由于同行嫉妬(妬),未知卓见以为然否?本馆之事照常进行,继任总经理已推定印君锡璋,亦公司中之大股东,曾任董事多年,在上海商界甚有名誉。知系廑注,并以附陈。”

同年张致蔡的信(未注明月日)中又提到这件事说:

“夏粹翁猝遭惨害,实出意外,差幸凶徒就获,当已引渡,藉申国典。惟主谋者早已闻风远扬。世途荆棘,夫复何言!开吊尚未定期,可否乞赐铭谥,尤所祷盼。现在继任者为印君锡璋,馆务一切照常进行,足纾廑念。”

夏瑞芳之被刺与当时政治有关,主使行刺的是国民党人陈其美。武昌起义后,陈其美领导党人光复上海,自任都督,在龙华建立上海军政府,南北议和后下野。1913年,黄兴等因袁世凯背叛

革命，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同邹永建等起来响应，纠合旧部进攻龙华制造局，因军力单薄，一夜间遭到惨重的失败，正在计划收集残余，从南市转移闸北。夏瑞芳得到消息，深怕闸北发生战事，商务和跟他自己有关的几家纱厂都将遭受兵祸，就同各纱厂主共同商定，由他向租界帝国主义集团请求派遣万国商团（帝国主义驻在上海的反动武装部队）在闸北人口处布防，使陈其美的计划不能实现。陈向商务筹借军费和由商务保管的闸北商团枪械，又被拒绝，因此对夏恨之入骨。夏未被刺前，曾接到陈其美的警告信。被刺的地点在河南路发行所门前。当时夏正从发行所出来，登上马车，就被一枪击中，立即送往仁济医院，已经无法医治。当时夏的小马车夫不过十五六岁，竟奋勇追捕凶手。凶手在泗泾路被巡捕抓获，据其在会审公廨供认，系受陈其美指使，因此不敢追究。

《石头记索隐》的出版

张元济致蔡元培的信里面有谈到出版《石头记索隐》问题，亦属书林轶事。1916年11月22日张在信中说：

“兄前撰《红楼梦疏证》奉示拟再加修饰，自为发行。……现在上海同业发行《红楼梦索隐》一种（告白剪呈），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鄙见著作权仍为尊有，照《租赁著作权章程》（附呈一份），版税照定价十分之一，似比自印自售较为简净。未知尊意以为何如？再，如蒙俯允，拟将孟莼荪所著《董小宛考》附入后幅，此项定价可以除去计算，敬祈裁核示复，以便遵办。”

同年12月8日，张给蔡的信中说：

“前得覆书，允将大著《石头记索隐》发行，谨悉，已请竹庄兄详细核校矣。”

我们从信中可以了解到有关的一些情况：这部书原名《红楼梦疏证》，蔡元培本想经过加工修饰后自印自售。由于张元济在报上见到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的广告，蔡书如迟迟不出版恐影响销路，遂动员他及早付印问世。信中提及的竹庄即蒋维乔，当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他是蔡的老朋友，此书经蒋维乔详细核校而后印出。信里附有商务印书馆1916年5月重订的《租赁著作权章程》（乙种）和“租赁著作权契约”各一份，据熟悉商务印书馆史的唐锦泉同志讲，这两份材料从来没有见过，足可补馆史材料之缺。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石头记索隐》初版于1916年9月，版权页上盖有“霍庸”篆书阳文图章一枚，“霍庸”系蔡元培的别号。

“五四”后张劝蔡勿再出

1919年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爱国学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北京大学则是这次运动的发源地，这是同校长蔡元培全力支持和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同他始终坚持和贯彻的办北大的“兼容并包”方针直接相关的。因为蔡元培同情学生运动并垂力营救被捕的学生，深为北洋政府所不满。迫于政治的黑暗，反动派的处处掣肘，蔡元培于5月9日留下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辞职启事，悄然离京，由上海到杭州小住。

1919年7月3日张元济致蔡元培之弟元康（字谷庸）的信中说：

“霍兄去浙后，未通音讯，近来想甚安好。闻近日教育部及大学教员、学生叠派代表南来，浼霍兄复出视事。不审果有其事否？惟霍兄出处关系甚巨，不能不格外审慎。以鄙见度之，霍兄此时似不可轻于再出，其原因盖有数端：一、政权必归安福派，其专横无理，可以想见；二、所谓旧学家必依附攀援，大张旗鼓，恐难免文字之祸；三、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

难裁制，纳之执范。霍兄出，而有补于世，固所甚盼，惟现在恐非其时。为大局计，为友朋计，均不能不一贡刍蕘。兄如谓然，乞为代达。”

蔡元培回到杭州后，确实各方面纷纷前来劝驾，希望他打消辞意，早日返京主持校务。不过北洋政府催促返京复任的电报，乃是在各界的压力下不得不故作姿态，所以蔡氏在复电中再次提请“解职，别任贤者”，并请将要专程来杭面催返京的教育部徐秘书“切勿劳驾”。张元济建议蔡元培不要复职的前两点原因颇有见地，认为段祺瑞为首的安福派专横无理，这是当时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他所说的旧学家当指林琴南之流，恐其藉以攻击，难免文字之祸，也是不无根据的。但是，他对于广大爱国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认识不足，所以他的第三点理由显然是错误的。就在张元济发信的第六天，蔡元培在校内校外的敦促下，发出了致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部一电，表示放弃辞职，希望学生安心求学。后来蔡元培在文章中表示，五四运动“影响实在不小”，他对于爱国学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一定的认识。

驱彭留蔡运动中张支持蔡辞职

1922年冬，北洋政府发生了教育总长彭允彝借口金法郎案，非法要求再次逮捕未曾证明有罪，并已经法庭宣告不起诉的财政总长罗文幹。蔡元培对于彭氏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是北大的同事，而且在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而其操守，亦为蔡所深信，为此不免大抱不平。他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会商，都认为有表态之必要。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随后并发表《不合作宣言》，表示不能与毫无人格的彭允彝为伍。隔了几个月，北洋政府中贿选总统的布置，渐

渐的实现,而要求蔡元培回校的代表,还是络绎不绝。蔡氏此时正准备出国,到欧洲考察教育。

1923年6月17日张元济致书蔡元培,他在信中说:

“知兄将复有北京之行。彭允彝势在必去,果晋京作一结束即行离去,于兄之原定计划并无阻碍。但不知教职员及学生之要求,所谓结束去彭运动者至何程度。一彭允彝去,而来者无非彭允彝,且愈趋愈下,倘有不如彭允彝者。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残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振也。”

一周之后,张元济又致书蔡元培,他说:

“奉六月廿一日手教,捧诵谨悉我兄北京之行业经作罢,闻之甚慰。此时都中只可谓之无政府迁流所极,恐尚有不止于摧残教育者,狂澜既倒,固非只手所能障而挽之也。”

“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残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以张元济这样一位旧知识分子,能看到北洋政府之实质,甚属难能可贵。他亟力劝阻蔡元培去北京的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豺狼当道的旧中国,蔡元培确实无法将自己的理想完全付诸实现,他终于走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到北大。但是,他给北京大学留下了革命的精神,创造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热烈而执着的信念。

蔡为中央研究院向“商务”索赠图书

1927年5月,蔡元培被推为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1927年9月2日张元济致书蔡元培说:

“承属之事,遵即转致馆中当局诸公。兹据复称,已就历年出版之旧学书籍如《汉魏丛书》、《佚存丛书》、《续古逸丛书》、《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顾氏文房小说》、《涵芬楼秘笈》

等七种，悉以捐送。又，拟将《续藏经》、《道藏》两书照普通定价再加特别折扣售与，均已与傅君孟真（即傅斯年）接洽等情，谨以奉覆。至姬君觉弥，向无交情，且又久未谋面，承属转询哈同所印之书，未能代请，尚祈鉴谅为幸。”

蔡元培向张元济索赠的书，显然是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集的图书资料。姬觉弥是哈同的左右手，哈同的夫人罗伽陵信仰佛教，印了不少佛学书籍，其中有《频伽大藏经》。看来，蔡元培是想通过张元济向姬觉弥征集哈同所印的有关书籍。

张对黄色电影、书刊深恶痛绝

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成立，这是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蔡元培就任院长。1928年5月15日，大学院召集之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开幕。蔡元培致开会词，提出三项教育方针：

“（一）提倡科学教育，一方面从事科学上高深之研究；一方面推广民众的科学训练，俾科学方法得为一般社会所适用；（二）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究学识机会，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三）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简言之，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

两天以后，张元济从上海给蔡元培寄来一信说：

“阅报知中央教育会昨已开幕，并读演词，忧深虑远，真老成谋国之苦心，钦仰奚似。窃有陈者，近来上海有数事于社会教育最有关系而影响于青年者尤大：其一曰电影，大都来自美国，其情节不外海盗与海淫，偶赁数椽，便可开演。今且推行及于内地，取费极廉，故人皆趋之若鹜，冥冥中我少年品性不知被破坏几许矣。其一曰性学，冒哲理之名词，行诲淫故技。

报章广告几于盈篇累幅，观其出品之多，可决其销路之广。昔时会审公廨尚有时示禁淫书；今则寂无所闻，未知何故？以上二事若不严加取缔，窃恐积极上谋教育之发达，消极上导教育于破产。何不于此大会之时严定检查及禁遏方法？各省教育专家经过一番讨论，异日各归其乡，必能切实施行。此不能不有望于我兄之登高一呼矣。”

旧社会黄色电影与书刊，充斥泛滥，毒害青少年之身心委实不浅。张元济有鉴于此，特向蔡元培呼吁，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在国民党政府里那些沐猴而冠的新贵们又何尝关心社会教育，即使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对此也束手无策，所以同年6月8日蔡元培覆张元济的信中说：

“前奉惠书，以电影与性学之害宜属教育会议诸君注意，甚感甚佩！因会议已将结束，未能具案提出，曾于谈话时分别属托，彼等均表同情也。检查电影事，别种议案中已有涉及者。惟此次会议竟无关涉性教育之案，故性学无正式禁条，然大学院必当随时取缔也。”

蔡的激流勇退 张的正义呼声

1926年2月，蔡元培应北洋政府教育部电促回国。到上海后，他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参加了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配合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开展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蔡元培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右派的“清党”运动。但为时不久，他就觉察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人民为敌的罪恶行径，再加上新贵们利用“教育”、“学术”的名义沽名钓誉和实现个人野心，这一切都同“元老”兼学者的蔡元培格格不入。他要激流勇退了。

1929年3月发生了蒋冯大战，张元济目睹国民党新军阀的火

并和肮脏的政治交易，对国民党政府极为不满，遂于3月19日致书蔡元培劝其发表宣言痛斥反动派并辞职引退：

“宁汉冲突，吾兄奔走调停，孤诣苦心，世人共见。观今日报纸战祸殆恐难免。吾兄去宁来沪，杜门谢客，殆因此故。国势颓敝至此，民生困苦至此，而在位者犹欲从事战事，试问天良何以对国？何以对民？吾兄此时亟宜发表正论，痛斥两造之非，布告国民速谋制止之策，并即日辞职，庶无负‘监察’二字之责（当时蔡氏仍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若辈知所忌憚，或能悬崖勒马亦未可知。去岁弟曾劝我兄勿辞，今时事已无可为，故再贡其愚诚，尽此忠告，伏祈鉴察。”

蔡元培的激流勇退开始于1928年8月，这时他辞去了大学学院院长及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携眷离开南京，定居于上海。蔡在1928年10月初，连上四次辞呈，辞呈中有“去志早决，义无返顾”等语。接到张元济的信之后，蔡元培于1929年3月22日覆信中说：“读惠书甚佩正论，惟目前曲突徙薪之工未竣，投鼠忌器之点尚有，不得不以沉默对之。叨在知爱，想荷鉴谅。”蔡元培的寥寥数语，反映了他处在当时反动势力之下，确有难言之隐，只得以“沉默对之”。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前半期，国民党反动派鼓吹法西斯主义，建立特务统治，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迫害爱国进步人士，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蔡元培痛心疾首。为了替中华民族保存一点元气，他拍案而起，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贡献

张元济辑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于1930年，中经“一·二八”之变，直到1936年才全部印成。所谓“百衲本”，是指采用的各